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3.005

“源流”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再认识

易绵阳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从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关系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发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确立于苏联,发展于中国,出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根据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历史研究,第二步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 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 F092; F1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3-0030-07

引用格式: 易绵阳. “源流”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再认识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3): 30-36.

Re-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 and Flow”

YI Miany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and flow”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we find that: firstly,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and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developed in China, and there are two theoretical forms: soviet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the theory of new-democratic economy, the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y of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is new historical logic,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to conduct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economic

收稿日期: 2020-04-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15AZD051)

作者简介: 易绵阳(1977—), 男, 湖南涟源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econd step is to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historical logic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必须完成的“时代答卷”。2015年以来，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问题还需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问题，就没有完全讲清楚，或者说，学界给出的历史逻辑，还存在逻辑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吴承明先生提出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关系论断。他说：“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1]2015年11月，首届“经济与历史：在中国经济学中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那就是认同吴承明先生提出的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关系论断^[2]。学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的科学的观点”^[3]。这实际上是一个论从史出的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既然如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演进逻辑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认识

近年来，学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如下四种认识。

第一，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张宇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张宇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确立于苏联，发展于中国，先后出现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以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后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的产物^[4]。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苏联政治经济学，其实践基础是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3]。张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他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6]据此看来，关于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实践的政治经济学，如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然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宇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看，还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4]^[30]但他又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批判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制作了系统思考并发表系列创新性理论观点，“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征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7]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既“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征程”，这显然在逻辑上说不通。

第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实践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王立胜研究员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王立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各阶段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伟大成果”，他把“各阶段”界定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于“站起来”阶段，成型于“富起来”阶段，完善于“强起来”新阶段^[8]。在这里，王立胜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三阶段”说。在另一篇论文中，王立胜又提出“五阶段”说。他按照党的领导集体的更迭顺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破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构建了基本框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现了新拓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9]。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实践阶段与党的领导集体的更迭并不完全一致，按照党的领导集体的更迭来划分发展阶段，没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阶段性。

第三，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简新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简新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晶”^[10]。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4年是初步提出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标志性成果；1987—1993年是基本形成阶段，标志性成果是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1997—2012年是有所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之后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城镇化道路、自主创新道路和“两型社会”等经济发展理论；2013年以来是定型成熟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讲话，正式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等重大理论^[11]。简新华教授与张宇教授的观点较为一致，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界定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

第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的经济实践

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逢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孕育到形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最早应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财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12]。

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的四种观点，相互之间的分歧较为明显。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头的认识不一致，逢锦聚认为要上溯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王立胜认为应上溯到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张宇的观点较为含糊，简新华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产生的经济理论。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分期的观点不一致，张宇提出“两阶段”说，逢锦聚主张“三阶段”说，王立胜提出“三阶段”说和“五阶段”说两种看法，简新华提出“四阶段”说。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历史逻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阶段，出现认识分歧很正常，也应该出现分歧。本文从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关系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进行再认识。

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的观点^[13]。实践经验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现实总是短暂的，现实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会很快变为历史经验，因此，实践经验主要表现为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流”，自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演进逻辑决定。因此，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之前，需先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演进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开始于什么时候，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界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全面启动。但是，在1956年之前，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已经广泛存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就开展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建设。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大根本点。那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中国的实践史是什么呢？下面扼要回溯公有制的实践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根据地的经济实践中，开创了公有制经济（国家所有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据此形成了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全国实施，成效显著，国民经济于1952年恢复到抗日战争之前的水平。1953—1956年，对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于1956年完成，所有制结构由多种所有制并存转变为单一公有制，但没有堵死非公经济的发展之路，1978年，尚存2%的个体经济。单一公有制有利于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但不利于激活微观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克服单一公有制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发展非公经济，非公经济的范围由个体经济逐步扩大到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央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中共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通过历史溯源，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在根据地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

针政策，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譬如，基于根据地所有制实践所形成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发展。1956年以后，多种所有制变成单一公有制，使国民经济失去活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非公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当前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已经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不过，那个时期的实践是局部的，即局限于根据地而非全中国，局限于某些领域而非全部领域，在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一方面吸收苏联经验，另一方面革除苏联经济模式中的弊端，根据中国实际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计划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吸收本国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局面，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历经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是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是中国独创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模仿了苏联模式但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性改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独创的，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因此，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揭示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再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是本文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植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政治经济学,可称之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理论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两者的共同理论来源^[1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历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形态。

把第一个和第二个结论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确立于苏联,发展于中国,出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其起点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新的历史逻辑,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界目前所提出的历史逻辑所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史演进逻辑不符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到底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构建路径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理论抽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遵循“由史而论”的构建路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再研究一般规律^[15]。恩格斯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先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历史性材料,即搞清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演变过

程,然后从经济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规律,最后把某些具有普遍价值的特殊规律上升为一般规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史论的统一。《资本论》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著作,“整个《资本论》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史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走向衰亡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理论”,《资本论》的“许多基本的论点都是从事实(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出发的理论,或者说是事实的推论”^[16]。马克思把归纳和演绎统一于科学抽象之中,他先从经济史中归纳出一般理论,然后又把一般理论放置于历史之中,运用演绎法,以具体的史实对理论进行检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17]。

循着上述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路径可以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历史阐释。就是客观、深刻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全貌,让世人认识中国经济是怎样走过来的、现在是什么状况。熊彼特指出,经济学家必须掌握历史、统计和理论三门基本技术,在他看来,“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18]熊彼特的这句话很切合中国目前的状况,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统计和理论两门技术的熟悉程度,毫不逊色于西方经济学家,但却患有“贫史症”,只知中国经济的今生却不明中国经济的前世。习近平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9]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如果不知道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就不可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经济,更不能从中国经济史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非常薄弱。1985年,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年)》是目前唯一一部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为主题的著作,但这部著作,上未溯源到根据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下未包含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因而,迄今无法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整体认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相关性最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起步也较晚。通史性著作主要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到七卷，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卷，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等；部门经济史著作主要有汪海波所著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陈光焱和叶青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杨希天编著的《中国金融史》第六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李子超的《新中国价格简史》等。尚未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经济史、企业史、城市史、经济体制史、对外开放史、计划经济史、市场经济史、合作经济史、集体经济史等著作的出版。正因为经济史无法为经济学提供真实而详尽的素材，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抽象无从着地。

第二步，理论分析和理论抽象。理论分析就是运用理论工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进行分析，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生逻辑与演进逻辑。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过程的解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解释则非常薄弱。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视角对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迥异作了解释，同时对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此书堪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上乘之作，遗憾的是，这样的书少之又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解释抱有浓厚兴趣。科斯和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对中国如何从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的计划经济，成功转型为活跃的市场经济进行了解释。白果和法国调节学派创始人阿格列塔所著的《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从长期视角考察中国道路的形成机理，试图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细腻剖析来揭示改革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很多特殊现象尚未得到合意解释。如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动力与绩效、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动力与绩效、经济发展道路的演进路径与逻辑、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逻辑、金融市场演进的路径与逻辑、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逻辑、西方式合作经济在中国难以发展的原因、集体经济兴起与发展的奥秘，等等。中国经济学界为何没有对上述问题做出合意解释呢？关键原因还是“贫史症”——由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缺乏深入的理解，即使掌握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也难以运用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解释性研究之中。

理论本身不能抽象出理论，理论也不能从方法中抽象出来，只能从实践中抽象出来。正如凯尔恩斯所言：“在我看来，经济理论不是借助数学工具就能够发现的，只能根据事实去发现。”^[20]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泉。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21]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3]。这个“系统化经济学说”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此，经济学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没有形成定论”^[24]。根据历史逻辑，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可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计划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篇，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所有制理论、发展观念理论、经济调控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供给与需求管理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等。分论既可分部门对部门经济进行理论抽象，形成中国特色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工业经济理论、农业经济理论、贸易经济理论、商业经济理论、集体经济理论、合作经济理论，等等；还可分微观经营主体对微观经济进行理论抽象，形成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个人消费与投资行为理论，等等。目前所出版的各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只涉及到本文所说的总论内容，基本上没有涉及分论内容；所涉及的总论内容，重点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深入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使人难以清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

历史阐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的真貌，理论分析和理论抽象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的规律。不廓清实践过程的本来面貌，就无法发现本质特征、提炼经济规律。只有先搞清楚历史，才能从历史中发现本质、提炼规律。

这就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包含两种形态: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基于史料归纳的历史叙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进行理论分析和抽象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态。历史形态是理论形态的源头,理论形态是历史形态的抽象,两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经过经济学界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出版了十多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教材。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不过,这些论著大都停留在描述层面,其理论深度远不及西方经济学著作,在实践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还不突出。目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任主要落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部分学者身上,从事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学者的参与度并不高。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经济史学界没有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流”关系,这就使得经济史学者找不到自己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位置;二是没有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去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从事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理论分析本身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经济学界应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分兵作战的方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融理论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应用经济学于一体的学术团体,分工协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入手,通过理论分析和理论抽象,构建既经得起历史检验又符合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吴承明. 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J]. 经济研究, 1995, 30(4): 3-9.
- [2] 王珏, 黄淳, 李黎力. 用历史的智慧开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经济与历史: 在中国经济学中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术研讨会”纪要[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1): 214-224.
- [3] 张宇.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N]. 人民日报, 2016-08-29(16).
- [4] 张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张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怎样一门科学[J]. 学习与探索, 2016(9): 1-8.
- [6] 张宇. 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7, 8(2): 3-12.
- [7] 张宇.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6, 2(2): 13-22.
- [8] 王立胜, 陈雪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1): 50-56.
- [9] 王立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4): 51-65.
- [10] 简新华, 余江. 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6): 4-11.
- [11] 简新华.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发展[J]. 河北学刊, 2017, 37(5): 117-121.
- [12] 逢锦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5): 89-110.
- [13] 张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J]. 经济研究, 2017, 52(5): 17-19.
- [14] 张宇.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6(1): 35-41.
- [15]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4.
- [16] 陈振汉. 步履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7.
- [17]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7.
- [18] 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1: 32.
- [19]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8-01-06(01).
- [20] 凯尔恩斯. 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6: 2.
- [21] 毛泽东.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1998: 803.
- [22] 习近平. 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 经济日报, 2016-07-09(01).
- [2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人民日报, 2015-11-25(01).
- [24] 李正图.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7): 11-17.

责任编辑: 徐海燕